

第十二章 贯彻“放手大搞”方针， 挫败国民党的进攻

一、挫败国民党的第一期“清剿”

解放战争进行一年后，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同国民党方面的情况相反，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其中野战军由61万人发展到100万人以上。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在1947年7月至9月间相继由内线转向外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则由战略进攻被迫转入战略防御。1947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深刻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阐明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

这时，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被动挨打，顾此失彼，处境日益不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危机也日益深重。蒋介石集团为了摆脱困难处境，于1947年7月4日提交南京国民党政府通过了《全国总动员方案》，接着又颁发所谓《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采取更残酷的手段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加紧搜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并进一步乞求美国援助，增加其继续进行内战的资本。华南是国民党统治的后方，蒋介石要取得外援，搜刮民财，支撑内战，甚至准备将来的退路，华南都是必不可少的基地。但是，自广东人民武装斗争恢复以来，革命武装迅速发展，游击区域不断扩大，摧毁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反对国民党“三征”的斗争日益发展，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在华南的统治。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确保华南，于1947年9月23日委派宋子文到广东，接替张发奎、罗卓英担任广州行辕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广东省保安司令三个重要职务，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妄图强化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

宋子文主粤后，在广东先后成立了9个“剿匪指挥部”，3个省际边区“联剿指挥部”（粤赣湘区、粤桂南区、闽粤边区），若干个县联合的“联剿指挥所”；同时更换了各县县长，从省到县实行“军政一体化”。随后，宋子文调集兵力，从1947年12月开始，对广东人民武装力量发动了第一期“清剿”。第一期“清剿”的方针是：“分区扫荡，重点进攻。”与此同时，为实现其“清剿”计划，宋子文对人民加紧“三征”，变本加厉地压榨人民血汗，以支撑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为了粉碎宋子文的进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于1948年2月在香港召开会议，分局书记方方作了《刘邓大军渡黄河后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分析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来的大好形势，总结了华南恢复武装一年来取得的胜利，对各地大搞武装斗争等工作作了部署。

会后，香港分局向各地区党组织发出《关于粉碎蒋宋进攻计划，迎接南征大军的指示》，明确规定了“普遍发展，放手大搞，大胆进攻”及“以进攻消灭敌人的进攻，以发展消灭敌人的进攻”的作战方针，以粉碎宋子文所谓“分区扫荡，重点进攻”的第一期“清剿”计划；还对军事斗争、群众工作、政权工作、统一战线及整党等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二月会议的召开及《关于粉碎蒋宋进攻计划，迎接南征大军的指示》的发出，为粉碎宋子文的“清剿”指明了方向。此后，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在新的方针指引下，从乡村到城镇，从山地到平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到处袭击敌人，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在斗争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摧毁国民党地方政权，建立、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把广东人民武装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南路，自广东人民武装斗争恢复以来，由于粤桂边区遂（溪）、廉（江）、化（县）、吴（川）和钦廉四属的人民武装斗争迅速发展，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惊慌。1947年9月，宋子文主粤后，确定对南路人民武装进行重点“清剿”。10月，按照宋子文的旨意，在湛江和高州分别设立第七、第八“清剿”司令部，并派广东省保警处处长陈沛接替被人民武装袭扰而疲于奔命的林英担任“粤桂南联剿指挥部”总指挥，并率领1500多人的机动兵力进驻湛江，纠合地方反动团队对高雷地区重点“清剿”，同时还指令粤保安总队和桂保安总队在合浦和粤桂边加紧扫荡，以配合高雷地区的“清剿”。12月，陈沛调集广东省保安第一、第二、第九、第十等4个保安团以及广西保安第六团和第九十二旅两个正规营共5000多人，对粤桂边化（县）吴（川）地区进行重点“清剿”。由于化（县）吴（川）地区党组织领导在政策上和军事上有失误，致使化（县）吴（川）根据地陷入敌手，化吴部队主力退至遂溪老区，回旋余地缩小，粮食、弹药缺乏，困难重重。这时，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指示：要保存革命力量，粉碎敌人各个击破的阴谋，把内线作战变为外线作战，以便分散敌人的兵力。接着，遵照香港分局指示，广东区党委委员林美南和中共粤桂边地委书记温焯华，在广东廉江县仰塘乡新村主持召开粤桂边地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香港分局指示和粤桂边地区的局势，为了粉碎国民党的“清剿”，保存力量，减轻老区压力和人民负担，开辟和扩大游击区，支援粤中区武装斗争，决定抽调高雷地区的主力武装组成两支部队，实行东征和西征，以分散敌人的兵力，使国民党的“清剿”计划落空。东征部队挺进茂（名）电（白）信（宜）和粤中地区，西征部队挺进粤桂边的十万山地区。同时，为了加强对各地党组织和军事斗争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雷州、钦廉四属、茂电信三个工委，组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东征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沈汉英任中共雷州工委书记，陈明江任中共钦廉四属工委书记，王国强任中共茂电信工委书记。东征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为欧初，第二支队司令员为支仁山、政委为温焯华，第三支队司令员为谢王岗、政委为陈明江、政治部主任为陈华。其中，由遂溪新一团、横县十九团和钦廉四属人民武装合编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

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确定广东南路为“全面扫荡，重点进攻”的“绥靖新策略”的

重点进攻地区，并任命国民党第六十三军军长张瑞贵接替陈沛为“粤桂南区清剿总指挥部”总指挥，开始对南路进行重点“清剿”。2月上旬，高雷地区的主力武装组成东、西征两支部队组成。西征部队以遂溪新一团为主，加上廉江一个独立大队、吴川光中团和化县一个中队合编成3个营、6个连和一个便衣队，共500多人，为团的建制。由金耀烈任团长，李晓农任政委。这时，从广西横县撤退到廉江休整的横县十九团300多人也编入西征部队。2月下旬，西征部队在第三支队司令员谢王岗、政委陈明江的率领下，从廉江县金屋地村誓师出发，经博白、合浦、灵山、钦县、上思等县境，于3月间进入十万大山南侧防城县滩（散）峒（中）地区，与防城二十团会师。这是1945年以来南路的部队第三次西进十万大山。

西征部队到达十万大山后，国民党当局当即集结重兵，对十万山区人民武装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清剿”。1948年4月初，十万山区人民武装在国民党军队大举“扫荡”之前，抢先挺进国民党兵力薄弱的广西思明地区作战。第三支队政委陈明江率领钦县二十一团及西征部队新一团、横县独立营一个连，首战攻陷思乐县九特乡公所，歼敌30多人。在十万山区人民武装向外线出击后不久，国民党广东保安第九团和防城自卫大队共1000多人，从那良逼向滩峒地区，企图歼灭人民武装主力。第三支队司令员谢王岗、副司令员黎汉威率领防城二十团及横县独立营一部，避敌锋芒，秘密转移到塘龙设伏。4月22日，国民党军队从峒中出动，经板八进入伏击圈，伏击部队立即出击，毙敌40多人。因此，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清剿”。

5月，张瑞贵又纠集广东保安第二、第九团和广西保安第六团以及地方反动武装共2000多人，对十万山区人民武装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清剿”。为了粉碎国民党的“清剿”，第三支队决定留下部分队伍在山南地区坚持斗争，新一团和横县独立营全部、防城二十团和钦县二十一团大部分队伍转移到十万大山北部，开辟新区。因此，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清剿”。

在钦廉地区，1947年底，建立了十万大山、六万大山与镇龙山互为犄角的游击根据地，钦廉四属武装队伍发展到2800多人，桂中南地区武装队伍发展到600多人。这使粤桂两省的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纠集了两省的保安团、警察大队及民团等地方反动武装近万人的兵力，对钦廉四属和桂中南地区进行“清剿”。并任命国民党师长黄质胜为灵山县县长，以此加强对六万山区的控制。又采取大搞联防、十户联保、铁壁合围的办法在合灵地区大肆清乡并村，残杀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寻找人民武装主力决战，妄图消灭钦廉四属人民武装主力。

1947年11月中旬，陈华和陆新率领部分武装队伍赶到横南，与谭俊、陈铭金、莫平凡等商议，决定采取避实击虚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国民党的“清剿”，并决定调集横县十九团、灵山十八团和钦县二十一团，共同打通横南经灵西到钦县的走廊，使六万山区和十万山区连成一片。为此，中共钦廉特派员陈华写信给十万山区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谢王岗，命令钦县二十一团东进钦灵边境执行打通走廊的任务。这时，国民党广西当局调集2个保安队和3个县大队，重点对横南地区进行“清剿”。为避敌锋芒，灵山十八团一部由陈华、陈铭金率领撤出横南，转向合浦；灵山十八团2个连由莫平凡率领渡江转移，在铁屎岭遭敌人袭击，牺牲20

多人，随后折回灵山。灵山十八团第一连留在白石水一带坚持斗争。由于交通站被敌人破坏，陈华写给谢玉岗的信件迟到，当钦县二十一团于1948年1月抵达白石水时，灵山十八团和横县十九团已撤出横南。钦县二十一团奉命在白石水和合浦二十四团联合攻打反动据点低寮垌。这时，国民党合浦军官大队来援，在战斗中，钦县二十一团一营营长朱守伦、第二大队队长曾作祐不幸牺牲。战后，钦县二十一团转移到合浦西场，再从西场经海路返回十万大山地区。

1948年春，为了消灭在合灵南区休整的人民武装，国民党合灵当局又纠集广西省保安队一团、二团和合浦军官大队以及合浦、灵山两县自卫大队共2000多人，重点对白石水、武利江沿岸游击根据地进行“清剿”，妄图一举歼灭合浦、灵山两县人民武装主力合浦二十四团和灵山十八团。为了粉碎国民党的“清剿”，陈华在合浦大成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前阶段的斗争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部署反“清剿”斗争。陆新、陈明景、谭俊、朱兰清、李廉东、卢传义、徐永源、朱伟、苏显枢、梁中光、钟古等六万山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香港分局关于“普遍发展，放手大搞，大胆进攻”及“以进攻消灭敌人的进攻，以发展消灭敌人的进攻”的作战方针，决定把部队分散活动，主力分路转出外围，积极向外发展，实行“外线作战，伺机打击敌人”的方针。会后，将合浦二十四团兵分四路，一路留守武利江沿岸，另三路分别到合博边、合灵边、合钦边活动，领导干部也分散深入到各地区。其中，由李廉东、朱兰清、苏显枢率领部分队伍，在合西北地区武利江沿岸坚持斗争；陈华、陆新、卢传义、徐永源、朱伟率领两个连到合东南地区的南康、营盘、公馆、白沙一带活动；陈明景、包恭率领一个连到合西南地区的西场、乌家、上洋、白花塘、三那一带活动；谭俊、梁干率领教导队一个排到合东北地区向张黄江以东禾仓水一带和马江以东博白菱角一带开辟新区。灵山十八团也分成四路，除留守灵山县外，其他分别到灵合横边、灵合博边活动。

陈华、陆新等率领合浦二十四团两个连到达合东南地区后，首先在香山后转移到博白朱龙村召开合东南会议，研究合东南、合博边情况。会议根据合东南地区封建势力深厚，村大碉堡多，官僚军阀、地主恶霸多，人口稠密，青年知识分子也多等特点，提出加强统战工作，孤立打击最顽固的敌人，争取可以团结的开明人士，建设有别于白石水的另一种类型的游击根据地。同时，坚持武装斗争，一方面武装镇压反动头子；另一方面派出武工队开辟新区，先后开辟了福成、闸利、常乐一带新区，使公馆、白沙、合博边的老区和南康老区基本上连成了一片，使中心城市廉州和北海逐渐陷于广大游击区包围之中。

谭俊、梁干率领教导队一个排到合东北地区的禾仓水后，继续东进渡过马江、南流江进入博白的菱角乡，与博白武工队会合，开辟了博白菱角、马子嶂一带新区，并在马子嶂同敌人进行一次战斗，牵制和打击了敌人。随后，谭俊、梁干率领教导队转移到猪笼村与从雷州地区西进十万大山西征部队会合。不久，谭俊、梁干率领教导队又返回横流水地区坚持斗争。

陈明景、包恭率领合浦二十四团一个连和横南独立连向合西南地区发展，开辟了合钦边新区，并与西场老区连成一片。1948年3月15日，陈明景、包恭率领合浦二十四团三连（连长

陈冠有) 70 多人和横南独立连(连长林朝连) 38 人, 分别驻扎在西场区沙岗乡高岭母须虾村的东、西两个小村庄里。17 日早上, 由于地方反动分子告密, 国民党合浦县自卫大队和西场自卫队共 300 多人前来围攻这两个小村庄。合浦二十四团三连和横南独立连凭借小村庄周围茂密的藪竹掩护, 把守进村路口, 严防敌人冲进村庄, 并利用民房作工事与敌人对峙。敌人接二连向两村庄猛攻, 由于两个连队防守严密, 顽强抗敌, 敌人无法进村, 也不敢接近村庄, 只好在离村庄较远的地方围守。这时, 在离高岭四五公里掩蔽治病的合浦二十四团三连指导员黄长业获悉两个连队遭到敌人围攻后, 立即派人寻找西场武工队队长叶崇业设法援救。叶崇业闻讯, 立即组织武工队队员和发动民兵准备救援, 并联络在大风江口和钦县犀牛脚海面活动的防城部队参与救援。接着, 叶崇业率领的西场武工队、民兵 50 多人和黄雄率领的防城部队 60 多人, 迅速赶到沙岗乡高岭母须虾村救援, 当天晚上 9 时左右突然袭击敌人。敌人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喊杀声吓坏了, 顿时慌乱起来。陈明景和包恭弄清情况后, 立即率领合浦二十四团三连顺利突围, 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周锦秀和林朝连率领的横南独立连也顺利突围, 与合浦二十四团三连会合。在这次战斗中, 共毙伤敌约 30 人。但苏初鉴、莫才振、文耿、文爱善、严福松、文乾善、王润、莫志兴等 8 位战士英勇牺牲, 包恭、劳振运、方振华等几位同志负伤。

高岭战斗后, 部队经受住了一次考验, 斗志更强, 士气更高。至 1948 年 5 月, 驻扎在西场的部队迅速发展到了 120 多人, 整编为两个连, 即合浦二十四团三连、十连。三连连长李甫思, 指导员黄长业; 十连连长陈冠有, 指导员邓传芬。除三连原有党支部外, 十连也建立了党支部, 发展了一批党员, 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对部队的领导, 并决定寻找战机, 打击敌人。6 月中旬, 合浦二十四团三连、十连与钦县和防城的部队共 230 多人, 驻扎在群众基础较好的西场北面游击区刘屋村一带时, 国民党合浦县自卫大队和西场地方反动武装共 160 多人, 向刘屋村进犯。驻刘屋村部队弄清敌情后, 在陈明景、包恭的统一指挥下, 除留下少数部队驻守外, 以合浦二十四团三连、十连为正面主攻, 防城、钦县部队为两翼, 向敌人发起猛烈的攻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 敌人抵挡不住, 向西场圩镇方向溃逃。刘屋战斗后, 进一步鼓舞了士气, 军威大振。

6 月下旬, 合浦二十四团三连、十连共 130 多人, 驻扎在合浦县白花塘乡(今石湾乡) 垌口村, 并准备向东北转移, 与合浦二十四团副团长率领的灵南部队联合行动。这时, 广东省保九团和合浦军官大队共 200 多人, 从沙岗向上洋一带巡逻, 并进入游击区探听情况。当敌人来到白花塘乡垌口村南边山时, 与部队哨兵交火。接着, 两连队在陈明景、包恭的指挥下, 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因敌强我弱, 两连队边打边向东北吊丝榕方向撤退, 以便靠近灵南部队。当大部分队伍强行渡过黄茅江到达对岸后, 即以岸边高地为依托, 向追兵猛烈开火, 掩护后续部队顺利渡过黄茅江。不久, 灵南部队闻讯及时赶来增援。随后激战了几个小时, 双方不分胜负, 直到下午 5 时左右, 战斗才告结束。两连队便撤至吊丝榕山上驻防, 敌人则撤退到鸦采木村。敌人撤退时, 在附近村庄大肆劫掠民财, 无恶不作, 群众恨之入骨。这次垌口战斗, 双方均有

伤亡，合浦二十四团三连连长李甫思不幸牺牲，炊事员王石生、庞福被敌人俘获，押至乌家杀害。在吊丝榕山上，陈明景主持召开团部会议。会议决定由陈明景、李廉东、苏显枢率领团部和一连渡过洪潮江返回灵南根据地；由包恭率领三连、十连返回西场区根据地。

与此同时，灵山十八团分散到灵合横边、灵合博边活动的部队也粉碎了国民党的“清剿”计划，开辟了广阔的根据地。

由于合浦二十四团和灵山十八团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把部队分散活动，实行“外线作战，伺机打击敌人”的方针。分散到各地的部队积极开展活动，机动灵活地出击，到处牵制打击敌人，使敌人始终找不到武装队伍主力，从而打乱了敌人的计划，挫败国民党的第一期“清剿”，保存了自己，扩大了游击区。

二、加强党的建设 发展人民武装

党的建设进一步加强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加强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中共香港分局于1947年10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指示，要大胆吸收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入党，建立新的基层组织；那些尚未恢复的组织，要尽快恢复；县以上的党委，要有专人管理干部工作；要健全党的领导制度，既要一元化领导又要分工负责；要健全党的民主生活，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2月18日，香港分局还就发展党组织的问题作了专门指示，指出形势的发展，需要大批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到各个岗位上去担任工作，而发展党员是培养干部与补充干部的源泉；革命斗争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又为发展党员创造了条件。为了使吸收党员的工作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指示规定了吸收新党员的原则、标准、步骤与方法，强调吸收新党员应该“着重质量而不是着重数量”，坚持“严肃谨慎与积极认真”的方针，保证党组织既能发展又能巩固。

1947年12月，为了加强钦廉地区党的领导，以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中共粤桂边地委遵照香港分局指示，决定成立中共钦廉四属工作委员会，管辖合浦（含北海、浦北）、灵山、钦县、防城等县党组织。1948年2月，第三支队司令员谢王岗、政委陈明江率领西征部队途经合浦时，陈明江向陈华传达了中共粤桂边地委的指示，正式成立中共钦廉四属工作委员会，书记为陈明江，委员为谢王岗和陈华。钦廉四属工委隶属粤桂边地委领导。1948年4月，中共香港分局决定加强粤桂边区党组织的领导，撤销中共粤桂边地委，成立中共粤桂边区委员会，钦廉四属工委隶属粤桂边区党委领导。钦廉四属工委的成立，统一了各县区党组织和人民武装队伍的领导与指挥，对于加强各县区党组织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巩固发展各游击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的“清剿”直至夺取钦廉四属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由于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处于发动公开游击战争和抗击国民党军事“清剿”的激烈斗争中，各地党组织和各县领导人都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军事工作上，大批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和党员骨干奉调到部队工作。随着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和农村游击根据地的开辟，武装队伍

中及地方上党的组织建设已经明显地落后，同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因此，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于1948年2月发出的指示中指出，“过去一年来无论党政军负责人，都极度忽视党的工作，使党的工作成为整个工作中最脆弱的一环”，“远落在客观形势发展的后面”。要求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把党的工作提到重要地位，大胆发展党的组织。同时，为了把党建设好，“使党更一致、更纯洁、更有力领导斗争”，香港分局在2月指示中还要求在党内军内普遍开展“三查三整”（开始是查成绩、查立场、查生活、整非群众观点、整自由主义、整小圈子作风，后来改为查立场、查工作、查生活、整自由主义、整享乐腐化、整好高骛远标新立异），从领导干部做起，由上而下，采用民主的、群众路线的方式进行。钦廉四属党组织以及人民武装部队按照中共香港分局的要求，大力加强地方和军队党组织的建设。

首先，加紧在武装队伍和农村中发展党员。按照在武装斗争、群众斗争中坚决、勇敢、有牺牲精神，能联系与团结群众，能起核心、模范与带头作用的入党条件，及党章规定的手续，大胆发展新党员。1948年，仅合浦县（含北海市、浦北县）就发展新党员186人，加上从外地派来合浦工作的党员22人，共增加新党员208人。

其次，建立和健全各县、区党组织领导机构，成立地委，恢复县委，县委以下设立区委，基层建立党支部，形成了地委、县委、区委到基层党支部的一元化领导核心。1948年8月初，粤桂边区党委为了加强钦廉四属党组织的建设，以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决定成立中共粤桂边地委，管辖合浦（含北海、浦北）、灵山、横南、永淳、兴业、廉江大部，化北以及桂东南五属（北流、陆川、博白、玉林、容县）等县党组织。并派黄其江、沈汉英到合浦县筹建粤桂边地委。9月，在合浦县多蕉乡冲掘垌成立中共粤桂边地委，书记黄其江，副书记陈华、沈汉英，常委黄明德。同时，撤销中共合浦县工委，恢复中共合浦县委员会，书记张进煊，委员陈明景、朱兰清、邹贞业、卢传义、徐永源。并设立中共合东南区委（书记卢传义，副书记徐永源）、中共合中区委（书记陈明景，副书记朱兰清）、中共合北区委（书记邹贞业）。中共粤桂边地委隶属粤桂边区党委领导，粤桂边地委下辖组织：中共广西玉林五属分委（又称桂东南分委）、中共合浦县委、中共灵横边工委、中共横永边工委以及廉江、化北党组织。中共合浦县委隶属粤桂边地委领导，合浦县委下辖组织：中共合东南区委、中共合中区委、中共合北区委。中共合东南区委管辖公馆区和廉北区的党组织，合东南区委下辖组织：南康总支、东成总支、白沙支部、宏德支部、良屋支部、陂头村支部、充美支部、南流江两岸支部、西成支部、盐田支部、公馆支部、浪坡支部、香山支部、龙颈支部。中共合中区委管辖白石水、张黄、旧州、常乐、灵南、西场区的党组织，合中区委下辖组织：白石水支部、张黄支部、旧州支部、常乐支部、西场支部、李家支部等。中共合北区委管辖小江、龙门、寨圩区的党组织，合北区委下辖组织：小江支部、龙门支部、寨圩支部等。至1948年底，中共合浦县委共管辖3个区委，2个总支，25个支部，党员有914人。

再次，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钦廉四属党组织在党政军干部中开展以“三查

三整”为内容的整党工作。通过“三查三整”，要求对有不良思想倾向和违纪行为的党员干部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者分别不同情况给予组织处理。通过开展以“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整党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提高了党员政治素质，党员组织纪律性增强，彼此之间更加团结一致，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战斗意志更加旺盛，从而使党组织在反“清剿”斗争中发挥更巨大的作用。

武工队与民兵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在人民武装建设方面。1948年9月，在恢复中共合浦县委员会时，调整了合浦二十四团（又称新六团）的领导班子，团长陆新，政委李廉东（后陆新兼），副团长朱伟，参谋长卢传义。新六团下辖7个连，共500多人。

钦廉四属党组织在发动游击战争中，坚决实行人民战争，并汲取了抗日战争时期武装斗争的经验，既重视主力部队的建设，也十分重视武工队这一特殊形式。规定武工队的具体任务是：(1)调查研究社会情况，认识地形，供给情报。(2)宣传组织民兵，打好社会关系，协助主力部队发展。(3)清除奸细，开辟经济来源。(4)锻炼自己，准备为主力部队补充干部。因而强调“武工队干部、队员应特别挑选”。1947年底，仅北海地区已先后建立了20多支武工队，每支武工队有10人左右。这些武工队一经成立就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在开辟游击根据地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武工队的队伍精干，机动灵活，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是党的政策宣传者和实施者，保持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1948年春至年底，随着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和新区开辟的需要，钦廉四属党组织从主力部队抽调一批骨干，加强各地武工队的力量，使武工队广泛分布在钦廉四属平原和山区国民党统治区，越来越发挥着主力部队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在钦廉四属党组织的领导下，北海地区的武工队在反“清剿”斗争中，迅速扩大队伍。在白沙、公馆区，白沙武工队广泛发动群众，在良屋港、宏德、东风、龙江和文明等村庄成立农会、担盐会、同心会等群众组织，农会会员数千人。一些村庄还建立了民兵队伍，配合武工队的斗争。1948年春，刘守仁率领武工队员约30人，并动员农会会员约700人，攻打白沙虎塘反动地主盐仓，运出生盐约2000担到博白龙潭等地出卖，解决了部队活动经费和群众的生活困难。1948年冬，廉江党组织派招茂生等到白沙，开辟了乌泥、英罗等海边村庄，并在各村庄建立民兵队伍，有力地配合了白沙武工队的斗争。公馆武工队也广泛发动群众，在茅斜角、陂头面等村庄成立了农会、同心会，在陈屋、杨屋墩等村庄成立了担盐会，在佛果浪、盐田、杨桃树成立了抗丁会等群众组织，会员达1600多人。钦廉四属党组织于1948年春从合浦二十四团抽调周洪英、廖明、范先琪等到公馆，各率领一支武工队在公馆海边和马兰、南山一带山区农村开辟村庄，从而加强了武工队的力量，扩大了武工队的活动地域。1948年7月，廖明率领武工队员约8人，活捉原国民党军队营长、六甘村官僚地主李耀武，逼迫他交出步枪10多枝，扩充了武工队的实力。1948年冬，武工队还分别在南流江中段的鸭山渡口、红沙港和

铁山港建立武装的流动税收站，收取过往商船营业税。税收站的建立，对于破坏国民党反动派的税收工作和解决部队活动经费，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南康、营盘区，钦廉四属党组织于1947年秋至1948年春先后从合浦二十四团抽调钟景彰、欧发仁、邹锦秀等到南康，重新组织武工队，分散开展活动。武工队广泛发动群众，在栗山、扫管龙、雷田、杨屋、宾池、南乐、居塘、盐灶、旱田、草标塘等村庄成立了农会和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农会会员约8000人。每个农会都组织了民兵队伍，各村庄民兵负责放哨、监视和捕捉反动分子、维持村庄治安等工作。1949年春，邹锦工队在盐灶、旱田一带村庄活动；欧发仁武工队向南康与石康交界地区发展，开辟斗鸡、大岭、红碑城、十字路、清水江一带村庄；邓治武工队开辟石头埠、赤江、卧龙村一带村庄；杨华流、叶广泰武工队开辟竹林、西村、白龙一带村庄，并向北海东郊农村发展；姚国厚、朱维河武工队开辟闸口乡的福禄、佛子、茅山、平坡一带村庄。1949年2月，欧发仁、邹锦秀率领武工队，发动白龙、婆围沿海村庄群众2000多人，围攻婆围乡公所。由于有叶炳光为内应，所以一枪不发便攻克了乡公所，缴获步枪10多枝，并打开婆围粮仓，分粮济贫。

在西场、三那区，西场武工队广泛发动群众，在常下山、三根树、五里坡、欧屋、马池沟、西坡、高岭等村庄成立了农会和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并在马池沟、西坡等村庄发动青壮农民，组织了民兵队伍。钦廉四属党组织于1948年春从合浦二十四团抽调周霖、林坚、林蔡到西场，加强武工队的力量，扩大了武工队的活动地域。林坚率领一支武工队到沙岗山区活动，叶崇业率领一支武工队在沿海村庄活动，这两支武工队互相配合，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3月，合浦二十四团部分队伍，被国民党合浦军官大队和西场自卫大队包围在沙岗高岭母须虾村。武工队队长叶崇业闻讯，立即率领武工队和民兵连夜赶到沙岗母须虾村增援，与被顽军包围的部队里应外合，使该部队能突出重围，向灵南山区安全转移。1948年秋，钦廉四属党组织又派黄长业到西场，率领武工队开辟合钦边的田底江、乌家和三那（那思、那丽、那彭）地区，使武工队的活动地域进一步扩大。随后，三那武工队开辟了大片村庄，策应了合钦灵边的革命斗争。

在中站区^[1]，钦廉四属党组织于1948年春从合浦二十四团和其他地区抽调朱有玢、赖洲、徐永清、陈杰、廖萍、陈铭荃、刘尊民等到中站区，建立党支部，组建中站武工队。武工队广泛发动群众，在中站周围林屋、吊丝榕、土瓜、蜜蜂田、九曲陂、苏屋、垌口等村庄成立了农会等群众组织，并建立了洪潮江税收站。4月，上洋乡白坭坑村有两名土匪冒充游击队员，到处偷窃群众耕牛、生猪和鸡鸭，并奸污妇女，无恶不作，当地人民恨之入骨。中站武工队查实后，及时逮捕枪决了这两名土匪，用武工队队长的名义出布告张贴于各村庄和附近圩镇，群众拍手称赞，当地中上层人士对中站武工队为民除害十分好感。在多蕉、道歌北区，合浦二十四团派黄平（黄祚利）、陈汉煜开辟武利江下游地区，并与当场党员刘宝兴、陈铭杨等7人组成一个武工队，在车板、皇后、水尾洞、多蕉、旧州一带村庄活动。1948年秋，遂溪党组织派黄色素、林坚等遂溪干部到常乐，使常乐武工队扩大到10多人。随后，武工队陆续开辟了莫

屋、岭脚、中间村、陈屋、吴屋、阁猪坡等约 10 个村庄，武工队每进入一个村庄，便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同心会，会员达数百人，使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同敌人作斗争。此同时，遂溪党组织派周霖、陈祥、陈光、陈均、沈余、陈棋、陈祥等遂溪干部到石康道歌北一带，与在武利江两岸坚持斗争的陈定恭、刘开祥等组成一个武工队，在武利江两岸的桥头、东边涌、双涌口、豹狸、沙帽岭一带活动，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保护和开展游击税收。随后，武工队广泛发动群众，在各村庄建立了农会、妇女会、同心会等群众组织。

在白石水、大成区，1947 年秋，合浦二十四团派郑宗仁、雷志南等，组成第一武工队，开辟张黄附近六罗、马栏、白石水、北通、升平、旧州一带村庄。不久，又派赖茂臣、梁国珍、李保山、王惠琼、叶仁甫等，组成第二支武工队。随后，为了迷惑敌人，把第一武工队称为合浦二十四团第二十一武工队，第二武工队称为合浦二十四团第二十二武工队。第二十一武工队在龙门涌、那陈坡、书房岭、东村岭、大园坝、凤凰角一带村庄活动；第二十二武工队在横流水、张黄西至旧州之间的村庄活动，先后恢复和开辟了以横流水为中心的猪口山、那田垌、茅岭、木头塘、山塘子、低浪塘等大片村庄。这两支武工队在白石水、大成区深入村庄，开辟新区，发动群众，把青壮年农民组织起来，建立民兵队伍，配合武工队以及主力部队的斗争，巩固和发展了白石水、大成游击根据地，使之始终成为主力部队可靠的后方基地。1948 年秋，遂溪党组织派陈马仁等遂溪干部到白石水、大成区，加强了第二十一武工队的力量在合灵两县交界的三合、古立区，1948 年冬，为了巩固和加强老区和开辟新区的工作，谭俊、陈铭金指示曹之醒，先后派刘业到古立，刘业金、李祐才、闭建才等到定更，曹效芬、曹宪章等到三合，与在古立坚持斗争的陈家仪、曹鸿维和在三合坚持斗争的曹琚珍等组成武工队，在山区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在各村庄建立了农会、同心会等群众组织，并建立武装队伍。

在小江区，武工队通过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广泛发动群众，先后在糯米江、大丰塘、赵屋、大田岭、棺材湾、鸡笠塘、坡禾地、鸡屎坡等村庄，成立了同心会、兄弟会等群众组织，会员达数百人。武工队还在马江设立游击税收站，为部队筹集活动经费。1948 年秋，钦廉四属党组织从合浦二十四团抽调黄河、林里仁、彭蔚藩、周平等到小江区，加强武工队的力量，扩大了武工队的活动地域。

在寨圩区，武工队先后恢复和开辟了合浦的寨圩、土东、乐民、六雅、平睦一带村庄，并广泛发动群众，在各村庄共组织成立了 30 多个同心会，会员达 400 多人。武工队还恢复了寨圩区党的组织活动，培养吸收一批进步农民和学生入党，壮大了党组织和武工队的力量。

北海地区的武工队在国统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组织民兵、农会和两面政权；在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反“清剿”战斗和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中，配合作战，及时提供情报，补充兵员、枪支、弹药，供给粮秣，解决经费等，作出了出色的贡献。而且，武工队还是北海地区人民武装建立地方团队的主要来源。到 1948 年底，活跃在北海地区的武工队，绝大多数编入了正规部队即合浦二十四团。合浦二十四团为坚持和发展北海地区的武装斗

争，配合南下大军最终解放北海地区起了重要作用。

钦廉四属党组织还注意普遍组织民兵，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各乡民兵组织，由建立民兵小组开始，一村一村分头组织，然后建立统一民兵组织。民兵的主要任务是在本地放哨、维持治安、传递情报、防奸防特、保护人民、配合部队作战等。在武工队建立初期，就在各村秘密组织民兵。到1948年，民兵队伍有了较大的发展。民兵平时参加生产，维护地方治安，战时参加巡逻放哨、侦察、救护伤员、配合作战。情报交通工作的加强

情报交通工作是党组织和部队指挥作战、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特别在钦廉四属党组织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又没有现代化的通信、交通工具的条件下，就更显得重要，它是各级领导的参谋和耳目。北海地区党组织十分重视地下情报交通工作，从1938年中共合浦特别支部建立起，就着手建立情报交通网点，随着党组织深入向农村发展，情报交通站也不断增多。1944年底，在合浦武装起义前夕，合浦党组织联络员兼军事特派员谭俊指派公馆区的刘守仁、傅玉峰、廖五十、徐永江、邹才衿、陈九思等不参加武装起义，留下负责情报交通工作，并部署了四条通南路特委的秘密情报交通线：一条山路线，由合浦各地通往白沙龙颈—博白那卜旧屋—清平—廉江—湛江；一条公路线，由合浦各地通往龙颈或宏德小学—白沙—山口—清平—廉江—湛江；一条水路线，由合浦各地通往宏德或龙颈—山口乘船—廉江安铺—湛江；另一条水路线，由合浦各地通往宏德或龙颈—山口对达乘船—遂溪—湛江。此外，革命根据地内部，村与村之间有情报交通线。在武装斗争期间，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日益扩展，根据斗争的需要，情报交通站更是星罗棋布，形成纵横交错的情报交通网。1947年底，北海地区共建立了60多个情报交通站，其中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北海市区就建立了6个情报交通站；而到解放前夕，北海地区建立的情报交通站达到400多个，情报交通工作人员600人。钦廉四属特派员陈华通过设在北海的情报交通站，先后视察了钦廉四属广大的山区和农村，了解各地党组织的情况，传达上级关于加强武装斗争、大力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对各地党的工作作了部署和安排。1947年至1948年，北海的情报交通站就接待和护送过多位中共高级干部的往返，其中有中共滇桂黔边纵领导人孙康，中共粤桂边区委军事特派员杨应彬，中共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庄田等。除了建立陆地的情报交通站外，通过北海的“展兴”号和越南海防的“公昌行”两个情报交通点，利用帆船运送军用物资和往返中越两国的中共人员。从越南运到北海的军用物资、枪支弹药、电台等，由北海的地下工作人员运往游击区。

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情报交通站日益增多，对情报交通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47年12月，陈华指派姚国厚建立灵山—合浦—博白—廉江—湛江（粤桂边区党委所在地）的情报交通线，并对情报交通站进行全面的整顿：一是重新确定站址、站名，以利于保密和联系；二是选派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担任站长，充实情报交通站工作人员。例如合东南地区在杨桃树建立情报交通总站，称为羊站，站长黄文松，站内情报交通站工作人员8人，下设18个情报交通站：海角、捷讯、电波、海马、固本、联报、水波、海丰、海洋、战马、战车、海水、西林、

天站、石云、高站、水车、坦克等。姚国厚还亲自前往各地调查了解情报交通工作情况，绘制出详细的交通联络图，并在图中注明革命村庄及安全线等，以便于同志们的来往和联系。

情报交通站除搜集情报、传送信件、宣传品、钱粮弹药外，还直接派人侦察敌情或深入国民党内部获取情报。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情报交通工作是一条十分尖锐复杂的隐蔽战线。许多情报交通工作人员，不分白天黑夜，不顾严寒酷暑，不畏辛劳艰险，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做出了许多功绩，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在解放战争时期，北海地区为党的情报交通工作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情报交通人员就有：北海的张启泰，公馆的范汝超、陈八哥、朱十七哥，白沙的陈炳芳，营盘的陈锡权，西场的陈国强、吴际堂，福成的陈德权，常乐的李瑞猷，白石水大成的朱桓山、吴忠元、肖主叶、包传绍、朱二嫂、黄亚兰、张祥安，张黄的蔡善文、蔡坤文、蔡大嫂、蔡企文，小江的潘孝彪、刘治材、陈德芳、宋美坤、陈工佳、梁家泰，樟家的赵文海、颜永孚、王献康、刘家奎、余四哥，寨圩的杨宗光、周发文，泉水的刘德成，乐民的韦万升等。

三、挫败国民党的第二期“清剿”

国民党的第一期“清剿”被挫败之后，宋子文一方面感叹“清匪难”，另一方面又不甘失败，为达到其“安定华南”后方基地的目的，从1948年6月中旬开始组织实施所谓“围困山地，肃清平原”的第二期“清剿”。

为了挫败国民党的第二期“清剿”，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总结反对国民党第一期“清剿”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下方针和任务：(1)从普遍发展中组织主力，提高战斗力，紧密依靠人民，有配合、有策应的歼灭宋子文的“清剿”部队，瓦解地方反动武装。(2)从纠正过去的错误政策中，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削弱封建势力的社会政策，改善群众生活，打下广泛而巩固的下层基础。(3)从推进发展中配合以有利条件的跃进，有方向的扩大游击区至邻县邻省，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填国民党的空格，造成边区山地的革命割据局面。并提出必须实行以下的策略：集中力量打击与人民武装为敌的反动头子、地方恶霸、首要特务，联合与中立不反对共产党现行政策的地主、富农和其他社会力量；实行反“三征”、减租减息、生产合作、救灾救荒的社会政策；按照合理负担的原则实施财政政策，保证财政收入^[2]。同时强调必须在中共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把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结合起来，使武装斗争与地方工作相统一，将本地区的斗争与邻省邻县的斗争协调一致，置宋子文的“清剿”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香港分局指示的引导下，广东各地人民武装积极组建主力团队，周密部署，展开了反对国民党第二期“清剿”的斗争。

在南路，为了挫败国民党的第二期“清剿”，香港分局决定加强粤桂边区党组织的领导，于1948年4月撤销中共粤桂边地委，成立中共粤桂边区委员会和临时军委，调梁广任粤桂边区党委书记兼临时军委主席，由黄其江任组织部长，温焯华任宣传部长。梁广抵达湛江后，于1948年5月底至6月初在东海岛主持召开粤桂边区党委扩大会议，着重总结化（县）吴（川）

地区武装斗争受挫的经验教训。随后，南路各地人民武装传达粤桂边区党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开展了整党整军教育运动。6月下旬，梁广在遂溪洋青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主动袭击国民党南路地区统治中心湛江市。会议还决定在高雷地区采取“先北后南”的方针，即先北上恢复化（县）吴（川）老区，后南下海（康）徐（闻），发展新区。这次军事会议，对粤桂边区被动局面的扭转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7月10日凌晨2时左右，在粤桂边区党委宣传部长、雷州地委书记、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支队政委温焯华和第二支队司令员支仁山的指挥下，以新八团为主力袭击了湛江，共毙伤80多名敌人，俘获40多名敌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袭击湛江，不但在军事取得了胜利，政治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人民武装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使国民党军队准备集中大股兵力“扫荡”南路根据地的企图受到了沉重打击。其次，人民武装在这次行动中，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保护了工商界和广大市民的利益，以实际行动宣传了党的城市政策。再次，这次行动是广东人民武装第一次胜利打中心城市，对全省各地区人民武装是一个很大鼓舞。

在十万山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大举“清剿”，1948年6月5日，由中共钦廉四属分委书记、第三支队政委陈明江在板蒙主持召开支队及部分县、团干部会议。会上，由香港分局派来的政治特派员李超、军事特派员杨应彬分别传达了上级指示，提出“坚持山区，巩固部队，积极发展，扩大外围”的反“清剿”方针。会议决定由防城二十团一部留守中心根据地，第三支队大部分兵力跳出外线，从十万山区的东部、北部和东北部三个方向加强外线反“围剿”作战，打击敌人。在东部，团长朱守刚率领钦县二十一团一个营于6月挺进邕（南宁）钦（县）公路以东的小董、板城、长滩和灵山县的百济一带，开辟和扩大游击区。在北部，第三支队政委陈明江率领遂溪新一团开拓南屏地区。在东北部，第三支队副司令员黎汉威率领由合浦二十四团主力编成的独立七团进入上思县境，于6月27日在上思独立营配合下，进攻该县民团司令部驻地龙楼，歼敌一部；于7月2日在东屏乡龙门村与国民党广西保安第六团一个营遭遇，歼敌18人；于7月17日，与钦县二十一团二营、独立营联合拔除崇合反动据点，毙敌2人，俘40多人；随后挺进邕宁县的大塘、那陈，威胁桂南重镇南宁市。9月中旬，中共十万大山工委和第三支队在上思县境，先后召开两次军事会议，全面总结反“清剿”的经验。接着，西征部队新一团和思明游击大队转移友邻地区休整；横县十九团返回桂中南地区。随后，新一团转移到云南与“老一团”会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第一团，为云南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1月中旬，国民党当局又调集1000多人进犯十万大山中心根据地东山、里麻山和北仑沟等地，防城二十团集中兵力击其一翼，在横龙歼灭国民党防城县警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毙正副中队长以下27人。11月29日，防城二十团又在孟沙霸歼灭国民党防城县刑警队，毙中队长以下18人。1949年1月28日，驻板蒙圩国民党广东省保安第一团第一连14人，经中共十万大山地方组织策反，将敌连长击毙后起义，防城二十团占领板蒙圩。至此，国民党军对十万

山区的重点“清剿”又被挫败。

在六万山区，合浦二十四团继续把部队分散活动，实行“外线作战，伺机打击敌人”的方针。1948年夏，谭俊、梁干率领教导队一个排从合博边转移到合浦县公馆区六湖洞，与陈华、陆新等率领的合浦二十四团两个连会合，先后在六湖洞的黄泥流和闸口福禄同国民党合浦县黄超成自卫大队进行了两次战斗，给敌人以重创。1948年秋，谭俊、梁干又率领教导队一个排转移到灵山，与陈铭金率领的灵山部队会合后，开到寨圩地区指导工作，建立寨圩党总支，扩大寨圩武工队，争取上层人物，积极发展六县边地区工作，使六县边的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8年8月初，粤桂边区党委派黄其江、沈汉英到钦廉四属加强领导，并带来了30多名干部。这批干部到钦廉四属后，在发动群众、开辟地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8月上旬，黄其江在合浦大成召开六万山地区党政军会议，陆新、陈明景、苏显枢、朱兰清、张进煊、李廉东、包恭、梁中光等参加了会议。会上，有人认为“打了地主，脱离农民”，要向地主赔礼道歉，并提出要“解散主力部队，改成武工队”、“不准部队打仗，要搞成灰色地区”。而合浦二十四团政委陈明景、副团长苏显枢等则极力反对这些主张。最后，会议决定精简部队，留下少部分精锐部队坚持小分队活动；提出“和上”（社会上层人物）、“搞下”（基本群众）的方针；并免去陈明景、苏显枢的部队职务，安排到地方去活动。由于一些同志从片面的狭隘的经验出发，仍然沿袭地下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死抱住与六万山地区形势不相适应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开始小搞，准备大搞”的方针不放，过高估计敌人，过低估计自己，右倾保守思想严重，所以大成会议作出的决定和确定的方针，既不符合香港分局为了挫败国民党的第二期“清剿”而提出的方针和任务的要求，也不符合六万山地区的实际情况。会后，合浦二十四团按照这次会议精神，将部队分散隐蔽，不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对敌斗争消极回避，不主动进攻。因此，部队不但失去了许多消灭敌人的战机，而且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致使士气低落，群众也丧失了信心。最终虽然挫败了国民党的“清剿”，但是给人民武装造成了较大的损失，特别是在武利江狮子湾战斗和西场大风江口战斗中损失很大。

8月中旬，驻守在武利江沿岸根据地的各连队都撤离了，负责掩护医院伤病员撤退的合浦二十四团第二连第三排共38人，在武利江边猪咀地方被约1000名敌人包围，虽然战士们顽强战斗，但终因敌众我寡，被击散困在狮子湾渡口两岸，隐蔽在草丛中。这时，敌人居高临下，用轻重机枪向战士们隐蔽的地方猛射，直至天黑以后两岸的战士才能会合，并突出重围。这次狮子湾战斗，虽然毙伤了一些敌人，但有班长陈井牛、陈成等6人英勇牺牲，损失轻机枪两挺。这就是分散回避战斗的结果。

10月上旬，包恭率领合浦二十四团三连、十连（简称西场部队）100多人驻扎在西场镇西南欧屋扫管岭村。由于反动分子告密，陈南等带领国民党广东省保九团和西场自卫大队共200多人，准备向西场部队驻地进攻。这时，西场武工队队长叶崇业获悉敌情后，立即派人到扫管岭村报告包恭，包恭马上命令西场部队紧急做好战斗准备。当敌人到达扫管岭村时，西场部队

便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经过约1个小时的激战，敌人见势不妙，即向西场圩边溃退。由于西场部队南临大海，没有回旋余地，不敢恋战，便边打边向东北的鲎港桥、凤凰头撤退。敌人以为西场部队迂回包抄攻打西场圩，便慌忙退守西场圩，龟缩在圩内不敢出来。因此，西场部队能够顺利地经过鲎港桥、凤凰头，转移到瀑水滩、田底江游击区活动。11月11日，包恭和陈冠有率领合浦二十四团三连20多人，在合、钦交界的大风江口海面一带活动，遭到4船国民党反动武装的突然袭击，包恭立即组织队伍还击。在激战中，连长陈冠有和黄阿五、黄二哥、文瑞彪等3名战士英勇牺牲。由于敌众我寡，包恭率领队伍离船撤退上岸，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吴清益、文标、裴玉蕴等4名战士在敌人的追击下，冲进大江村的一座小楼顽强抵抗。面对敌人的强攻和诱降，这4名战士坚贞不屈，决心战斗到底。随后，敌人放火烧楼，这4名战士在烈火中英勇就义。包恭的警卫员许小弟和一位灵山籍战士吴阿四负伤后，在黄敬村被敌人逮捕杀害。大风江口战斗共牺牲了10位同志，这是西场部队在反“清剿”斗争中损失最大的一次。

由陈华、陆新、朱伟等率领的合浦二十四团两个连在合东南地区不断地袭扰敌人，逼其撤走。1948年冬，国民党军队在公馆、白沙游击区中心香草江陈家祠驻扎两个连，以便控制周边革命村庄，四处勒索迫害革命群众，对陈华、陆新、朱伟等率领的部队和公馆、白沙武工队的活动构成较大的威胁。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与敌人硬拼，陈华、陆新、朱伟等决定采用“敌驻我扰”的战术对付敌人。于是，陈华派合浦二十四团第二连会同当地武工队在夜间到敌人的驻地周围高地向敌营开枪扫射，在铁皮桶里燃放鞭炮；组织附近村庄的群众出来助威，喊冲喊杀，弄得敌人既害怕又疲劳，消耗弹药也不少。这样不断地袭扰敌人，不久敌人便不敢在此驻扎，悄悄地撤走了。1948年底，国民党广东省保二团一个营和团部驻扎在公馆圩，妄图捕捉钦廉四属特派员陈华。这时，隐蔽在公馆圩的地下工作人员黄志立摸清敌情后，把敌军官经常在晚上到范绍崇（国民党退伍军官）的商铺里打麻将聚赌的情况向陈华报告。于是，陈华等研究决定：袭击麻将场，活捉敌军官。1949年初的一个晚上，合浦二十四团第二连在当地武工队的配合下，潜入公馆圩，并派出人员对合浦五中（敌团部驻地）、关帝庙（敌兵驻地）、镇公所进行警戒；副团长朱伟、二连连长黄金兰率领突击队和一个排，由黄志立引路袭击麻将场。但一个突击队员在途中不慎跌入露天粪坑中，发出响声，麻将场内的敌人听到响声后立即冲出大门，四处逃窜。由于天色很黑，突击队员无法看见敌人，只朝有响声处猛烈开枪射击。各据点的敌人在驻地也向外开枪，警戒人员予以还击。最后，合浦二十四团第二连和武工队撤出战斗。这次战斗虽然未达到活捉敌军官的目的，但对敌人震动很大，不久敌人便撤离公馆。

至此，在钦廉四属党组织的领导下，钦廉四属人民武装坚决贯彻执行香港分局“放手大搞”的指示，放手发动并紧紧依靠群众，机动灵活打击敌人，又挫败了国民党的第二期“清剿”，度过了困难的时期，并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壮大。钦廉四属战场从此结束了敌我长期反复的“清剿”与反“清剿”的战争形式，钦廉四属敌我态势发生了转折性的重大变化，使国民党由重点

进攻转为重点防守各孤立据点，而人民武装则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四、农村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钦廉四属党组织在开展游击战争过程中，以毛泽东关于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为指导，不断加强农村根据地的建设。把开展抗“三征”、实行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与武装斗争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连在一起，从而促进了武装斗争的发展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钦廉四属党组织吸取革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从准备发动公开武装斗争时起，就把建设巩固的农村根据地摆到首要的位置。建设革命根据地，核心是建立革命政权。这是有效地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动员组织群众支援革命战争，进行根据地各项建设的保证。1947年4月10日，广东区党委在《关于蒋管区游击战争一些问题研究大纲》中指出：“政权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核心。由于广东大陆仍是游击战争的环境，尚未形成巩固的根据地，因此，不适合建立形式鲜明的民主政权，而适合造成掩蔽形式的两面政权，准备游击队分散或撤退，甚至遭受挫折时，仍可以继续保持。到了形成巩固的根据地，应即毫不犹豫地建立地方民主政权。”^[3]至1948年春，广东人民游击战争节节胜利，人民武装力量迅速发展，有些地区已建立了主力部队，人民武装的活动区域也已由点的控制发展到面的占领。这时，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认为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在1948年2月《关于粉碎蒋宋进攻计划迎接南征大军的指示信》中，向各游击区发出了建立民主政权的指示：“在敌人力量已被我摧毁，或敌人力量弱而难以控制的地区，即应发动群众组织民主政府。在国民党力量强大，或敌我拉锯的地区，仍应以秘密的或两面政权为主，以免过早暴露，遭受破坏。”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当局对各游击根据地发动全面“清剿”，一些地区由于主观指导上的失误，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上造成较大损失。因此，香港分局于1948年8月在《关于半年工作总结和今后方针任务》中对根据地政权建设再次作出指示：“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公开的一面政权或秘密的两面政权两种不同形式，但残酷的斗争环境，应以共产党领导下秘密的两面政权为主。”钦廉四属党组织在发动公开武装斗争初期，由于游击据点尚不巩固，武装队伍流动性大，为顾及群众利益，利于自身发展和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按照香港分局和广东区党委的有关指示精神，建立了一批乡、村一级的两面政权，在敌我处于拉锯状态的平原地区，更以秘密的两面政权为主，逐步压缩旧政权，待时机成熟，则正式建立民主政权。1947年至1948年，在六万山和十万山地区已建立了许多游击据点，这里的国民党乡村政权已被摧毁。各地党组织派出武工队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农会、妇女会、同心会、民兵队伍等组织，为建立政权准备条件。

1947年6月至8月，钦县、防城两县在钦防农民翻身总队控制的地区成立了防城县行政公署，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十万山地区第一个县级民主政府。防城县行政公署下辖三光企、东山、扶勤和垌中区人民政府。1947年秋，以合浦白石水区大成为中心的合灵边，在人民武装所控

制的区域里，各乡村已连成一片，一些乡成立民主政府。这时，受共产党教育和影响较深的伯劳开明绅士陈学海等，写信建议钦廉四属党组织成立县级人民政府，实行减租减息。钦廉四属党组织认为建立政权对于进一步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巩固和扩大游击根据地都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接受了开明绅士的建议。1947年10月，合浦、灵山两县在合灵边双垌口成立了合灵南区军政府，由陈明景代主席，苏显枢任副主席，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六万山地区第一个县级民主政府。合灵南区军政府下设政治、宣传、民运、财政等部门，管辖合浦县的白石水、大成、旧州、张黄、常乐、多蕉、道哥北、石康和灵山县的文利、伯劳、武利、升平等10多个乡镇约10多万人口的区域。随后，合灵南区军政府颁发了《二五减租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征粮征税条例》。在辖区内成立农会，实行“二五减租”；组织民兵，惩治反革命分子，拔除了到耽、牛神水、洞口、秧地塘、低寮垌等反动据点；建立交通情报联络站，开办弹药厂、医疗站等；建立税收站，合理征税征粮，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鼓舞了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横征暴敛，巩固和发展了六万大山游击根据地。防城县行政公署和合灵南区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十万大山和六万大山中心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1947年夏至1948年秋，合东南区各乡镇（包括北海市区和廉州城）以及合中区、合北区的部分乡镇，还处在较为困难的阶段。由于这些地区属于国民党力量强大或敌我拉锯的地区，因此，建立的政权多是两面政权。1948年春，陈华在博白朱龙村召开的合东南会议上提出，要在公馆区搞两面政权、两面村庄、两面人物等多种形式，建设有别于白石水区的另一种类型的游击根据地。因此，安排一些同志出任乡保长，或争取一些乡保长掩护支持革命同志。如安排钟高球任白沙乡第十保保长；傅玉峰任对达保保长；陈铭桂任东成乡乡联保队副队长等，使公馆区的许多乡村建立了两面政权。其他区的一些乡村也以不同形式先后建立了两面政权，巩固和发展农村根据地。

在民主政权建立以前，根据地建设的许多工作，都是由武工队担负的。由于部队作战任务频繁，难免所顾不及、军政脱节。民主政权建立以后，根据地建设的各项工作，都在民主政府统一组织领导下发动群众来做。这样，党的方针政策更加具体落实，工作更有计划地进行，群众运动更加深入发展，根据地建设更趋完善和巩固，人民游击战争真正有了可靠的后方和向前发展的基地。

民主政权的施政方针是根据人民的要求，以彻底解放人民，服务人民，为人民谋利益，使人民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人为最高目的。在尚处游击战争的条件下，主要是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援前线，以确保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为此，钦廉四属各根据地的民主政权都进行了大量工作，十万大山和六万大山中心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是比较全面的。防城县行政公署和合灵南区军政府成立后，在建立、健全乡村基层政权的同时，加强了对群众团体的组织和领导，所属各乡镇普遍建立了农会、妇女会、同心会和民兵组织，普遍开设夜校，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对民兵组织加强统一领导，进行整训，提高其素质和能力，配合部队作战，维

持根据地治安秩序，镇反肃特，劳武结合。部队开出根据地后，一切守卫均由民兵负责。民兵组织上了轨道，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这样，根据地的政权更紧密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在群众运动方面，在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过程中，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组织发动群众向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势力的斗争。但当时主要精力集中于应付战争的环境下，一些具体政策和实施办法未有明确规定，曾出现某些过左过急的做法（如错定成分，凡出租土地者不论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一样退租减租以及减息比例偏高等）。防城县行政公署和合灵南区军政府成立后作了纠正，防城县行政公署和合灵南区军政府相继颁发了《二五减租条例》、《清债减息条例》，并就有关政策及实施办法作出明确规定，集中体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争取中立富农和守法地主，缩小打击面，集中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减租方面，评年成后实行二五减租；地主除主产物按减租额收取一定地租外，副产物概归农民所有，取消一切劳役、季节送礼及超经济剥削；贫苦的革命军人家属、华侨及孤儿寡妇，因无劳力而出租少量土地以维持生活，生活水平不超过当地一般中农标准者，免减或少减。减息方面，以年利20%(30%)计算清还；凡旧债交息已达原本一倍者，停息还本，已达原本二倍者，本息停付。由于以往高利贷剥削严重，贫苦农民往往要以田地、房屋等顶债，因此，以上减息规定还不能满足农民的合理要求。民主政府从实际出发为农民着想，又提出清债赎业，规定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以前之高利贷债务一律停付，其抵押债务之土地、房屋等抵押品，应即交还农民；凡利用盘剥、利用积欠陈租复利，强迫农民变卖之产业，经查证属实者，该项产业应无条件交还农民。这一措施使农民卸却了身上的封建剥削枷锁，受到农民的欢迎。在做法上，由农会组织减租减息委员会，业主、农会、乡政府组成年情评定委员会，经过广泛宣传、深入调查、三方评定后，召开群众大会，出布告照减。清债方面则由乡政府组织清债委员会，依靠贫雇农团，发动群众清理。对个别抗拒清债的地主恶霸则展开斗争。由于政策规定明确，有组织、有领导地发动群众来做，使“双减”（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效果。不仅在十万大山和六万大山中心根据地普遍开展，而且在两面政权地区也实行了减租减息，农民得到了很大利益，使党的威望影响大大提高。

在减租过程中，由于贫农田地少、雇农更没有田地，因而得益较少，中农则得益较多。根据这一实际，为打破地主对土地的垄断，照顾广大贫、雇农的利益，民主政府在减租过程中规定：“减租后政府与农会可根据自愿原则，适当调剂耕地，使耕地太少之贫苦农民，增加一部分佃耕地，借以维持生活。”并提出调剂耕地的具体措施：在不变更业权，不损害中农基本利益前提下，部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只是部分变更佃权，“裁长补短”、“调多挤无”，不是平均分配。同时注意到“调耕”必须达到增产目的，不把土地从勤耕的农民手里调给不事生产的二流子，解决好“调耕”后的劳动力使用、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如种子、肥料等）的供应调剂等问题。在进行过程中，重点是从地主阶级控制的公尝田和部分佃耕较多的中农手里拿出一些土地，调给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采取“多用说服，少用强制”的方法，并特别强调走群众路线

线、干部带头和集中领导三个问题，始终加强领导，不放任自流。在做好一系列工作基础上，先调公尝田，后调私田；优先调给烈军属的无田者；佃耕地较多的干部带头自愿献出。因而工作开展顺利，收效很大，得到广大贫雇农的衷心拥护和中农的同情支持，也削弱了封建势力。与此同时，各根据地的党和政府还在当时环境条件下，采取积极措施领导群众增加生产，发展经济。

在财政方针、政策方面，是以党的阶级路线为依据，以发展革命战争需要为出发点。开展游击战争初期，钦廉四属各根据地都在穷乡僻壤山区，人民生活贫困。因此，主要措施是：(1) 袭击与摧毁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及地方反动武装，缴获枪支弹药、物资，补给军需。(2) 组织贫苦群众破仓分粮，既破坏国民党的经济给养，又分粮救援贫苦百姓，部分作军粮。(3) 打击土豪劣绅，没收其财产，或罚粮款作为军需，或分其浮财济贫。(4) 用说服劝募方式向地主、富农、士绅、殷户借募粮（款），在游击区和蒋管区，这方面是主要的财政来源。(5) 向大乡村的公尝派粮，把封建宗族的资产转为革命财政收入。这些措施在创建根据地初期，或在新游击区是切实可行的正确途径。但是以这种办法作为根据地财政收入，还是不够稳定的。因此，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和部队，除了在反“清剿”作战时，采取外线作战，发展新区，开辟新的财源，并以此打破国民党的“清剿”和经济封锁外，还逐步建立起收税机构，实行经常收税，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措施之一。对此，中共中央香港分局1947年12月的《关于税收问题指示信》中强调指出：建立正式的经常性税收，以保证部队的给养，支持解放区的财政。并对建立征收机关——税站的工作作了规定。

钦廉四属党组织于1946年6月就在合灵边武利江两岸建立了六万山地区第一个税站——武利江税站。随后，相继建立了大风江、洪潮江、马江和赤江等税站。贯彻香港分局关于税收问题指示后思想更加明确，税收工作更加规范、有序，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原来只在内河征收农副土特产税和商品税，从1947年起逐步增收盐税、铁锅税、陶器税及陶土（白泥）税等，征收范围遍及六万山地区的交通要道、大小圩镇、主要厂场和沿海一带，直到敌人防守严密的合浦县城附近和北海市郊。为避免国民党的袭击，初期许多站址没有固定，而是建立流动税收站，以灵活的突击方式流动收税。公馆区党组织于1947年在公馆成立税收总站，下设几个分站，在圩上和全镇区域内收税；于1948年还分别在南流江中段的鹤山渡口、红沙港和铁山港建立了武装的流动税收站，收取过往商船营业税。随后，钦廉四属党组织又建立了石头埠、三合口、营盘、南康、闸口、西场、大风江口、火鸽、大塘、江口、张黄江、白沙、双埔口、水边铺、大坡、马路坡、急水港、良屋港和灵山的钦江等税收站。建立税站进行收税，对保证部队的军需和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发挥了很大作用。税站的武装人员生活艰苦朴素，除收税外，还配合武工队宣传群众、借枪募粮、发动青年参军以及配合部队作战，有力地支援了游击战争。

1948年秋，钦廉四属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和香港分局的指示，贯彻“合理负担，保证财

政”的政策，实行征收公粮制度，以筹集更多粮食，克服部队给养困难。这一政策的实行，根据地财政获得新的生命力，在支持游击战争、建设和巩固农村根据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根据地人民积极建设和保卫根据地，配合部队作战，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反“清剿”战争的胜利。农村根据地成为钦廉四属解放战争的基地，而十万大山和六万大山中心根据地更起到总基地的作用。

五、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

统一战线工作是人民武装开展活动、进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不可缺少的工作。还在武装斗争开始恢复时期，广东区党委便指示各地党组织和武装部队负责人要注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不但要争取友军和商人，对地主阶级中不同派别的人物也要区别对待，对那些受到国民党统治集团排斥的人要注意联络。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使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面临着新的抉择。为了团结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1948年2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发出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全面而系统地规定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和对待各种政治力量的政策，并指出：“统一战线工作，最重要是强调依靠贫农，坚决联合中农，争取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小商人等。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派或中小地主成分的开明绅士、富农，则应该尽量利用他们的两面性，利用他们的矛盾，使其不反对我们或不过早反对我们，消除或减少我们发展的阻力。”

钦廉四属党组织有着重视统战工作的良好传统，许多领导干部都亲自做统战工作，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随着钦廉四属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统战工作从对象、内容到策略方法都有新的发展，在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削弱、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加强游击战争的进程以及建设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8年钦廉四属游击战争从“小搞”发展到“放手大搞”，人民革命力量在斗争中由弱变强，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反动统治由强变弱，农村革命根据地从形成到巩固，加上全国解放战争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惨败及其反动政策的丧尽人心，其营垒日益动摇分化，人民大众和各阶层进步人士都寄希望于共产党，中间人士倾向共产党。在这一总形势下，钦廉四属党组织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政策，贯彻执行香港分局、广东区党委的指示，从当地实际出发，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在钦廉四属党组织的领导下，北海地区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在开展武装斗争过程中，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抗“三征”、减租减息，摧毁国民党乡村政权，建立人民政权，进行根据地的建设，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同民主人士团结合作，争取中间力量，分化、瓦解反动营垒（包括不反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地主乡绅、乡保长等），对乡村政权人员采取有打有拉，打拉结合（即武力控制与教育说服结合）的策略，以及通过各种社会关系，

争取或控制了一批乡、保长、自卫队长及国民党政府公职人员等，使他们站到同情革命一边，为人民做点好事，起码守中立，从而壮大革命营垒，确保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1948年春，钦廉四属党组织从合浦二十四团抽调一批干部加强武工队后，公馆武工队的力量得到加强，基本控制了广大农村，在公馆至闸口一带的村庄，由武工队和朱伟率领的主力部队，根据这一带村庄大、人口稠密、地主恶霸多的特点，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分化瓦解反动势力，先后制服了曾任国民党海南禁烟局局长李五云、陈济棠卫队军需处处长赖俊超、大地主陈玉芬等公馆区有名的地主官僚势力，打开了受他们控制的盐田、陈屋、大路滕等大村的局面，震慑了这一带地方反动势力，鼓舞了广大贫苦农民，建立了农会、同心会、担盐会、抗丁会等群众组织，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尽管这时公馆区的革命斗争环境还相当困难，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都已看到，共产党的政策是可以信赖的，人民革命必然胜利，国民党一定跨台。公馆香山村曾任国民党营长的朱贵，在共产党的影响争取下，一贯保持中立，并于1948年带领两个儿子参加革命；盐田村曾任国民党广东省揭阳县县长的李拂尘，在共产党的影响及教育下，一直保持中立态度。此外，公馆区的许多地主和保甲长，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都采取消极中立的态度，使武工队和主力部队扩大了活动区域。

中站武工队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化阻力为助力。1948年初，合浦县白花塘乡（今属石湾镇）鸦采木村副保长赖汝玑反对其胞兄赖高八叔参加武工队，中站武工队了解到赖汝玑出身贫苦，租耕地主的田地，本质是好的，只是为了避免国民党征兵而担任副保长等情况后，决定由中站武工队副队长赖洲利用宗族关系，多次登门拜访，对赖汝玑进行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使之转变态度，支持胞兄赖高八叔参加革命工作。随后，经过不断的教育，赖汝玑也参加了革命，并积极做上层人士的工作。1948年3月，中站武工队为了争取白花塘乡乡长陈绍福支持革命，利用陈绍福与党组织负责人朱兰清、李廉东是合浦廉中的同学这个关系，通过鸦采木村开明绅士易朝伟等，把朱兰清写给陈绍福的信送给陈绍福，中站武工队队长朱有玑、副队长赖洲首先代表朱兰清、李廉东向陈绍福问好，然后向陈绍福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战争形势，争取陈绍福支持革命，并向陈绍福提出四条要求：（1）白花塘乡公所若在中站区进行“三征”，事先要向武工队打招呼，取得武工队同意；（2）国民党军队若来骚扰中站区，要迅速秘密通知武工队；（3）不干扰武工队在白花塘乡的活动；（4）双方来往要严守秘密。陈绍福首先请易朝伟等代向朱兰清、李廉东、谭俊等同学问好，并接受朱有玑等提出的四条要求。从此，中站武工队在白花塘乡的各项工作开展得很顺利。4月，中站武工队为了争取国民党合浦县参议员罗国康（曾任白花塘乡乡长）支持革命，利用罗国康是朱兰清、李廉东的中学老师这个关系，朱有玑等到白花塘乡浊水村罗国康家里，转交朱兰清、李廉东写给罗国康的信，并向罗国康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战争形势，争取罗国康支持革命。罗国康向朱有玑等表示，欢迎武工队进入浊水村活动，对周围这带村庄他会向绅士和群众进行宣传。因此，武工队顺利地开辟了中站一带的村庄，并在一些村庄建立了两面政权，使中站一带成为南联党

江、西场，西通三那，东连合浦县城的北枕山区游击根据地。上洋乡副乡长何家坤与廉州党组织负责人岑焕祥的妹夫何光阔是同宗关系，中站武工队通过岑焕祥写信给何光阔、何家坤，请他们支持革命，并由赖汝玑亲自带信交给他们。何家坤于1949年6月先后两次与赖洲、徐永清等详谈，表示支持革命，并送给中站武工队500发子弹，还嘱咐其父亲在上洋开的保元堂药店配药免费送给患病的武工队队员。

1948年秋，南康武工队注意教育争取中上层人士，如对雷公田保长进行教育，使之保持中立和掩护武工队。对地方土匪实行教育改造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有些土匪经教育后，不敢为非作歹，对屡教不改的惯匪钟喜沟实行镇压，群众十分拥护。对反动分子则加以警告威慑，如对反动的赤江保长许林嵩、栗山保长陈世荣、地主钟乃兴等，经警告后不敢嚣张作恶，有利于武工队的活动。南康武工队通过统战工作，使南康广大农村都在武工队控制之下，武工队可以到处活动，为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常乐乡处于平原地区，武工队活动易于暴露，群众工作较难开展。因此，常乐武工队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分化瓦解反动势力，为开辟村庄和开展群众工作创造条件。1948年秋，常乐武工队队长黄平两次深入旧州反动堡垒吴屋，找常乐自卫中队原队长和吴屋族头谈话，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战争形势，展开政策攻心，提出解散保队，撤除哨卡，不准袭击人民武装部队，允许武工队进村活动等条件。吴屋保队慑于形势和武工队力量，一度收敛反动气焰。于是，常乐武工队顺利地开辟了旧州、皇后等一片村庄。常乐乡水尾洞保有10多个村庄，但常乐乡乡长朱子炎组织保队设卡放哨，使武工队难于进入水尾洞保的村庄活动。黄平便通过党组织，把与朱子炎有过交往的穆致昌调到常乐乡协助工作。当黄平和穆致昌率领常乐武工队到达水尾洞保时，水尾洞保队队员都熟悉穆致昌，便打开哨卡。于是黄平和穆致昌率领常乐武工队进入水尾洞找朱子炎谈判，朱子炎被迫同意武工队进入水尾洞保各村庄活动。

寨圩武工队在开展统战工作时，着重争取上层人士支持革命。寨圩中学校长覃炳璋在当地很有威信，又思想进步，一贯同情、支持革命。寨圩武工队负责人蒙英翰是覃炳璋的学生，因此，蒙英翰率领武工队于1948年重返寨圩后，便与覃炳璋取得联系，覃炳璋表示将尽力帮助武工队在寨圩区开展各项工作。覃炳璋的家乡土东一带村庄的地主富户较多，封建反动势力较强大，当武工队进入土东一带村庄活动时，一些地主恶霸跑到寨圩中学报告覃炳璋，覃炳璋却向这些地主恶霸表明，这是他同意武工队进村活动的。当武工队要地主捐粮、捐钱、捐枪支持革命时，这些地主恶霸又跑去找覃炳璋告状，覃炳璋又向这些地主恶霸说明武工队队员都是好人，希望他们也支援武工队。因此，这些地主恶霸虽然对武工队又怕又恨，但慑于覃炳璋的威望和影响，也无可奈何，只好任由武工队在各村庄活动，开展各项群众工作。与此同时，寨圩武工队为了争取土东乡乡长莫杰材支持革命，利用莫杰材是蒙英翰的同学这个关系，由蒙英翰对莫杰材进行争取教育，晓以大义，取得了莫杰材对武工队的暗中支持，使武工队比较顺利地开辟了土东一带大部分村庄。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于1948年2月发出的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从本意上说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集中力量反对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派，但是在指示中的一些规定不够完善，加上缺乏实践经验，一些人对党的政策理解不深，致使在贯彻执行过程中，一些地区偏离了党的政策，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如一些根据地在土改过程中，对地主阶级中的不同派别没有区别对待，打击面过宽，在分田分浮财过程中侵犯了华侨和工商业者的利益，因而树敌过多，孤立了自己。6月至8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粤桂边区党委连续发出工作指示，其中对南方游击区一些地方过早实行土改以及在军事斗争、群众斗争中某些不注意政策的问题，提出纠正。强调目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农村人口90%以上的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及各革命阶层的力量，缩小打击面，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保证不要侵犯中农、独立生产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华侨及开明绅士的利益；对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要有坚定的立场和灵活的策略，要有步骤、有区别、有分寸的对待，以争取游击战争的胜利。北海地区党组织结合实际，按照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粤桂边区党委的指示，对各地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认真的检查总结，肯定成绩，并对实际工作中某些过左过急的做法采取切实的纠正措施，促进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健康发展。

在此期间，北海地区党组织还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策反工作，实行既争取又斗争的方针，一方面开展政治攻势，另一方面选派干部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运用各种方法，对国民党官兵进行分化瓦解。1948年底，南康武工队对南康商会队开展策反工作。首先选派干部找商会队班排长的家属、亲朋进行启发教育，通过他们去做这些班、排长的思想工作，进而让他们带其亲人与武工队会面谈话，使商会队副队长等人有了一定觉醒，为最后转向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当南康武工队配合合浦二十四团进逼南康时，南康商会队副队长吴成珍于1949年5月初发动官兵20多人起义反正。

1948年冬，西场武工队对西坡保队开展策反工作。首先选派干部对西坡保队进行争取教育工作，逐步建立了联系。当西场自卫大队大队长陈南怀疑西坡保队“通共”，企图以检阅为名，借机将西坡保队缴械时，西坡保长黄仁德和副保长翟继庆于1949年4月30日发动官兵38人起义反正。随后，西场武工队和西坡保队整编为西场区中队，为了西场的解放事业继续战斗。

1948年，是钦廉四属各个游击根据地和人民武装经过艰苦战斗而获得迅猛发展的一年。北海地区乃至整个钦廉地区开始形成农村包围敌占城镇的局面，革命形势已发展到一个转折点：人民军队由防御转入进攻，而国民党军队被迫由进攻转入退守。

[1] 中站又名鸦采木站，鸦采木村位于合钦灵边境，原属合浦县白花塘乡，今属石湾镇。

[2] 广东省人民武装斗争史编纂委员会：《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第四卷，第186、187页。

[3] 广东省人民武装斗争史编纂委员会：《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第四卷，第241页。